

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

孙 立 平

在本文中，作者认为，现代化是整体性的，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一场全面性变革过程。但在实际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可能将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同时推进，从而现代化在不同方面、不同因素之间，在时间上就形成了一种先后不同的序列关系，即现代化的时序模式。作者从政治的先决条件、经济起飞与政治整合的时间问题、经济现代化的延滞问题、社会与文化变革问题和城市化问题五个方面分析了现代化时序模式的主要差异；作者还从起点条件、危机与挑战出现的顺序、示范效应和现代化策略等方面探讨了影响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差异的重要因素。

作者：孙立平，男1955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现代化是整体性的，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场全面性的变革过程，但在实际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可能将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同时推进。这样，现代化的不同方面、不同因素之间，在时间上就形成一种先后不同的序列关系，我们将其称之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

对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实际现代化进程中的分步推进与理论上现代化的整体性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不同的现代化时序模式之间存在哪些主要的差异？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本文即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探索。

一、整体性与异步性

自5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现代化过程所做的大量研究清楚地向人们表明，现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整体性变迁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涉及经济、政治、价值系统、社会心理、组织结构、区位结构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而且这些方面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还在于现代化意味着文明的转换，即从一种传统文明转变到一种现代化文明。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也明确地启示人们，这种整体性的历史变革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跨度中才能全面展开，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同一时间里，将现代化的所有方面同时向前推进。类似的努力，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但结果都往往是以失败告终。相反，只有那些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将整体性的现代化任务逐项展开的国家中，现代化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会给人以极有益的启示。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领导人“凯末尔面对为实行现代化通常会遇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民族共同体的界定、现代世俗化政治组织的创立、社会和文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等”^①。在这种情况下，土耳

^①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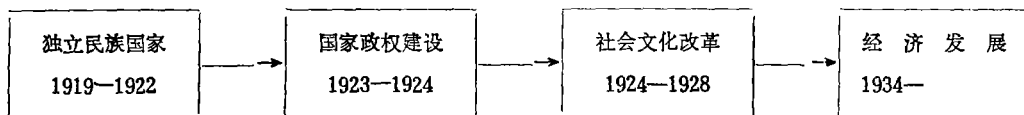
其的现代化推进者们面临着一种抉择,是同时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将现代化全面推向前进,还是将这些问题仔细地分解开,以期在不同的时间里解决不同的问题。事实表明,土耳其的现代化推进者们选择的是后者。亨廷顿认为“凯末尔所设计的解决问题的顺序,是从他能得到最大支持的方面依次转移到可能引起最大阻碍的方面”^①。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为另一个问题的解决提供条件。

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标志着一个旧的政治共同体的毁灭。因此摆在当时土耳其现代化推进者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在保存下来的安纳托利亚(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色雷斯(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地域上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形成这样一种新的政治共同体,是其现代化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这一任务主要通过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避免触及国家政治权力问题,而且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力量,同外来侵略者进行斗争,最终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在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建立后,凯末尔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一个能有效推进现代化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上。首先,废除了苏丹制,接着废除了哈里发制。到1928年,又取消了宪法中有关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文。实现了国家政治从君主制到共和国制的转变以及建立世俗国家的任务。同时,利用掌握的最高权力,建立新的科层行政机构,以为现代化措施的实施创造条件。“正是通过这一系列谨慎的、有分寸的改革步骤,世俗的共和民族党的现代政治体系终于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系”。^②

在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奠定之后,现代化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与文化改革方面。于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开始了。封闭了独立的宗教学校和学院,统一了公共教育;逐步废除伊斯兰法,开始草拟新的法典;废除旧的历法,采用格里历;用罗马文字代替阿拉伯文字;废除一夫多妻制的伊斯兰教法规等。

经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在30年代才将经济现代化提上日程。在1934年,土耳其宣布了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土耳其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29—1938年间,国民收入增长44%,在1938—1955年间增长了71%。在1960—1976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9%。^③



这一时期土耳其现代化的历程可以概括如上图。当然这并非是说,这种顺序关系就是当时土耳其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选择,更不意味着这个顺序关系可以无条件地适应于其他国家。这种顺序关系给人们的真正启示在于,现代化这个整体性的变迁过程是可以,而且在实际的过程中也往往只能是逐步展开的。换句话说,实际的现代化过程往往是整体性与异步性交织在一起的。

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异步性所呈现的顺序关系,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这里,

①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40页。

② 同上,第342页。

③ 同上,第174页。

我们可以对其中几个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做一简单的描述，作为分析的基础。

日本

如果说土耳其是在经历一场民族革命后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日本则是以渐进改革的方式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日本的现代化也是以政治变革（明治维新）为开端。这场政治变革主要实现了两个任务：第一，以明治天皇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化推进者掌握了国家的实际权力；第二，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这一点与土耳其有较明显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日本在政治变革基本完成之后，马上就开始了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与之相对照，土耳其的经济现代化则明显滞后。在日本的经济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与文化变革，但这种变革从来没有象土耳其那样成为某一现代化阶段的中心内容。土耳其在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建立20多年后，即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日本的政治民主化则推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且是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才勉强开始了这种进程。这时距明治维新，已经快有100年的时间了。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同日本现代化的时序模式较为相近的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也大多始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但现代化一启动，经济现代化就占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地位。以至有人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所经历的实际是一种工业化过程，而不是现代化过程。这种看法虽然不无偏颇，但也确实可以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主要是以工业化为特征。但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但政治民主化则长时间没有提上日程，只是在近几年内，政治民主化的迹象才开始显露。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在缺乏政治民主化的情况下，实现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的，这对那种认为政治民主化与收入平等有一种必然联系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挑战。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印度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明显区别之外在于，它从独立伊始，就建立了一种仿效西方的民主政治。“自1947年独立后，正常运转着的国会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就已存在，还存在着有关自由的大量的规范性条件：如自由的普选”^①。但在经济上，却看不到这种现代化的迹象。由此摩尔说：“关于印度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说法虽属老生常谈，却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从经济上看，印度还处在前工业化时代。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两种资本主义方式的工业革命，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工业革命，在印度都没发生。这里不仅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而且也没有自上而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也没有农民革命。但按照政治划分，它确实属于现代世界”^②。只是在近些年中，印度的经济现代化才有较为可观的进展。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与此有些类似，虽然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现代化有较大反复，但现代政治体制还是有了基本的雏型，同时，社会与文化的变革也有一定进展。与印度相似的地方是，其经济现代化也是明显滞后了。

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虽然拉美的历史传统有其很强的独特之处，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也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但从现代化的时序模式看，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这里的为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变革有着比东亚更大的局限性，同时二者在社会结构方面也存

① 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52页。

② 同上。

有着巨大的差异。这里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了比东亚更为严厉的专制主义统治,但政治动荡的现象还是经常发生,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也比东亚弱得多。在6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并不逊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但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因此可以说,在拉丁美洲,除经济现代化外,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均进展甚微。

美国

美国是拉美的近邻,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却和拉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现代化的时序模式上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土耳其相类似,美国在现代化之初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如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疆界的确定,中央政权的建设,南部的落后的经济体制的清除,发展经济等。实际上大部分国家在现代化开初时都会面临着这当中的大部分问题。但美国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几乎在同时解决了这一切问题。因此,帕森斯认为,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地将现代化同时全面推进的国家。之所以会如此,有两个条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一,充裕的资源和有利的地理位置为这种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第二,美国没有历史,一切从头做起。除了这两点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在它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英法等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使得美国可以在现代化一开始,就利用早发国家已经形成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推进工业革命并在政治上建立现代化民主制度。

英国和法国

与其他国家相比,英法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现代化的两个国家。在这两个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时候,没有任何别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在这两个国家中,现代化不同部分间所表现出的顺序关系,更表现出一种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的纯粹内在的逻辑关系。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又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英国较早地由封建王权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不久又建立了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并在世界上第一个开始了工业革命。法国却中间屡经反复。虽较早地进行了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尝试,但政治整合的时间却推后了,工业化也不能不受到影响。

德国

德国的现代化也是开始于德国统治之后。有人认为德国没有经历政治变革就直接开始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这是不确切的。在德国现代化开始的时候,曾进行过有限的政治变革,但这种变革几乎完全是为了强化国家机器,并没有真正实现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也没有为以后推进民主政治奠定基础。这种现代化的时序模式与其他因素相结合,使德国最终走向了一条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形成帕森斯所称的“灾难性现代化模式”。

二、现代化时序模式的主要差异

以上我们对一些有代表性国家现代化的时序模式进行了描述。那么,这些时序模式的实质性差异在什么地方?这些差异又可以对现代化的进程及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分析的。

1. 现代化的政治先决条件问题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几乎在所有能成功启动现代化的国家中,都经历了相应的政治

变革。这种变革的意义在于，在政治上形成可以启动现代化的力量与条件。在有些国家中，是通过渐进的变革方式，由现代化的领导人和机构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政治领导人和机构；在有的国家中，则或是通过民族革命、或是通过国内的政治革命的方式实现了这种转换。但无论以什么方式，所需解决的问题是共同的。

这个问题对“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就显得尤为突出。在英国等这样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主要是自己内部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长和积累的结果，推动现代化的力量主要是来自于民间。特别是在其现代化的初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消除障碍等，而很少直接介入经济等社会生活。而“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情形则与此截然不同。在这些国家中，现代化不是内部现代性积累的结果，而是强行从外部引进的变迁过程。由于旧的现代性的缺乏，现代化往往缺乏民间力量的支持，相反，强大的传统力量往往成为现代化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来推进现代化，现代化才有可能启动和成功。由此可见，在后一种类型的国家中，能不能通过政治变革为现代化创造必不可少的政治上的先决条件，就成为这些国家能否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关键。在前面的描述所涉及的国家中，大部分都属于创造了这样的条件而成功地启动了现代化的。但同时，实际上还有相当一批国家由于没有形成这种条件而至今未能成功地启动现代化。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和南亚。

为启动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先决条件可以大致概括为如下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第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真正的政治共同体的建立；第二，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全国性的领导权；第三，具有现代取向的、高效率的行政科层系统的建立，以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现代化的手段。对于成功地启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这三方面的条件几乎是缺一不可。没有真正的政治共同体的建立，真正的全国性政权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现代化的推进者也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现代化推进者掌握全国性的权力，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国家政权只能成为维持传统社会的手段；没有现代化的有效行政科层系统的建立，现代化的推行者们也无法动员全国的资源以进行现代化的事业。

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三方面条件的形成，在不同的国家中会面临不同的情形和问题。

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通过结束殖民主义统治而形成的新的独立国家中，现代化的推进者的形成和掌握权力是相当容易实现的。在经过民族解放斗争而实现独立的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往往就成为独立后现代化过程的主要推进者。此外，一次成功的政变、或一次领导集团权力的自然交替，都可以为现代化推进者获取权力提供机会。但在这样的社会中，形成其他两个方面的条件却相当困难。在这当中，有相当一批国家在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人口和疆界的重组和重新界定；更有相当一批国家（主要在非洲）是在部族政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民族国家的。因此，新的政治共同体缺乏存在的基础，国家并不能将原来的许多个小的政治共同体整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不过是徒有虚名。在另一方面，现代化推进者们也很难建立起作为自己推进现代化的手段的行政科层管理系统。这种困难既表现在，在现代教育极不发达的社会中很少有训练有素的可以从事现代化行政管理的人才；同时也表现在，当这种机构向全国各地延伸的时候，往往遭到强有力的地方势力的抵制。由于既缺少稳定的政治共同体的保障、又难以建立起得心应手的管理系统，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推进者在推进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往往就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

而在没有成为完全的殖民地、在近代没有经历人口和疆土的根本重组的国家,情况则与此不同。比如俄国、日本和中国19世纪下半期的现代化过程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些虽然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但基本上都是自主的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有着较强的连续性,旧的统治集团虽然在不断受到挑战,但其统治大体上是稳固的。这种类型的国家与前一类国家相比,现代化的推进者的形成和获取权力要更为困难。这些现代化推进者往往是从旧的统治集团中分化而来。能不能实现这种分化以及分化出来的现代化推进者能不能获取最高权力,往往就成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能否启动的关键。当现代化推进者们获取了这种权力之后,他们马上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由旧时代继承下来的行政管理系统。这个系统的性质会有很大差异。有的经过改造可以成为推进现代化的手段,有的则成为现代化的障碍。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现代化推进者们仍有一个建立自己的管理系统的任务。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管理的传统也会有助于新的管理系统的形成。这与在部族政治基础上建立的新国家是截然不同的。

2. 经济起飞与政治整合的时点问题

经济起飞和政治整合的时序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工业化、经济起飞之前就实现了为经济起飞所必需的政治整合,这种类型可以英国为代表。另一种类型则是政治整合与经济起飞同时进行,两者交织在一起。法国、德国以及许多“后发外生”型国家即属于这种类型。

政治整合是经济起飞和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从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角度看,政治整合意味着形成这样一种政治系统:能保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并形成有利于投资和技术进步的条件^①。政治整合与前面所论述的启动现代化的政治先决条件有直接关系,如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强有力的能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行政科层管理系统的建立,就是政治整合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政治整合还包含着其他内容。第一,对新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吸纳,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能够吸纳这些力量的制度。第二,现代化推进力量的集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化和其他一些措施实现的。第三,政治整合的组织纽带的建立。在这方面,除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之外,中间组织起着重要的作用。罗兹曼认为,可以对政治整合起重要作用的中间组织主要包括(1)负责治安管理、税收和人口登记的基层行政组织;(2)教育组织;(3)商业组织,商人、工匠、雇佣劳力或家庭借助这些组织与其他从事类似职业的人们打交道;(4)宗教组织;(5)公共事业社团。^②

这种政治整合实现的状况如何,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罗兹曼在比较19世纪下半期的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进程时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些很好的可以进行现代化的条件,如职业的多样化、高识字率、社会流动、契约关系和市场交换等。但“对于一个现代化后起国家来说,更有利于现代化的还是其它方面的社会条件,上述中国的那些条件并不能派上用场”^③。他指出,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就需要有大规模的资源积聚,但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首先,从中央一级政权的作用和能力上看,在18世纪的时候,中国的清政府是强大的,其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无疑是进行现代化的最有力的

① Y·Murakami《从整合看现代化:日本的个案》,收于艾森斯塔德主编《现代性的模式》。第二卷,第65—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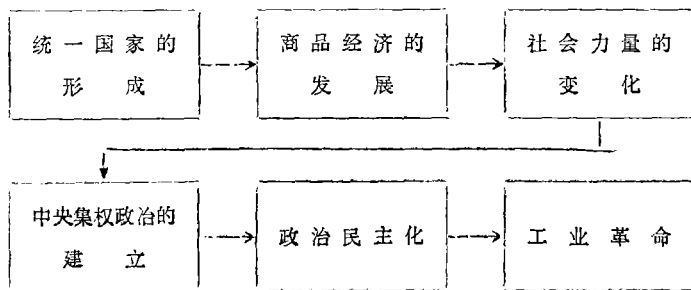
② 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20—221页。

③ 同上。第239页。

条件,但在这个时期,“满清政府除了为安全原因进行恐吓和监视这些带消极性的措施外,对于国家任何经济发展方面的目标几乎不感兴趣^①。在19世纪下半期,当它被迫认识到不能不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中央政权已经大大被削弱而变得无能为力了,“其政治手段及强制权力被削弱、分解和抵消了”。^②这两种情况都表明,一个苟且偷安的中央政府没能肩负起对现代化特别重要的领导作用,而在成功的现代化后起国家里,中央政府都发挥过这种领导作用”。^③

其次,从现代化力量的积聚来看,“日本和俄国日益加强的城市导向与中国的决定性的农村导向是泾渭分明的。日俄两国都在行政上采取了措施,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城市,居住城市地区的精英也要求进一步这样做。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日俄出现一次次的城市化浪潮,导致农村在新的都市势力影响下发生种种转变,导致财富和人口相对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地方上的中心。中国政府却没有采取新的政策来促进都市集中,其上层精英仍散居各地,结果,城市网明显地处于分散状态”。^④第三,从中间组织的作用来看,“中国社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缺乏能够起抗衡作用的中间组织,资源也分散在各地。……社区组织以及社区之间的联系都缺乏象日本和俄国社区那样的力度。……中国缺乏社会整合的特定因素,尤其是在地方和县一级。在那里,互相分离的各社区的财产本来是可以合并起来的”。^⑤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整合的状态,对现代化进程及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但如果对罗兹曼认为较成功地实现政治整合的日本和俄国的情况与英国等国家的情况做进一步的对比分析,人们又会看到另一种类型的重要差异的存在。休格将英国现代化中不同因素之间的顺序关系进行了如下的概括:首先是经济活动的变迁,然后导致新的社会力量出现,集权化国家的形成,最后是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⑥在这个顺序上,还可以加上两项,即前面加上统一国家的形成,后面加上工业革命,即:



在这个顺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在政治现代化与工业革命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间隔,如果从统一国家的形成算起,这个间隔大约有300年的时间,如果从1640年或光荣革命算起,也有100多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从经济上看,大规模的、突飞猛进的工业革命还未到来,但在平稳的外表下,工业革命的力量在积累,与之有关的各种因素都在稳步地发生变化。这种状况无疑为政治的现代化,特别是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

自法国以后开始现代化的国家,则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些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时候,

① 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4页。

② 同上,第82页。

③ 同上,第86页。

④ 同上,第240页。

⑤ 同上。

⑥ 休格:《经济与政治现代化:土耳其》。收在华德和拉斯托主编《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第147页。

世界性的工业革命已经发生。无论这些国家的价值系统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存在如何大的差异，几乎都毫不例外地将“赶超型”经济现代化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在将“富国强兵”的防御型现代化作为基本目标的国家，这一特点就显得更为突出。其直接结果就是，在这些国家中，政治整合和经济起飞是同时发生的，而且两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其政治现代化将更少有自己的独立性，而表现出更强的经济取向。

3. 经济现代化的延滞问题

对日本和土耳其现代化的过程做一简要的对比，会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日本的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大体是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此时距明治维新开始，大约是20年的时间。在这二十年中，“经济没有什么增长，然而为了加强统一，对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把封建地方主义的某些方面压了下去。这些都有助于为以后取得惊人的增长准备了条件”。^①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是紧密衔接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土耳其的情形与此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表面上看，土耳其的政治变革到工业化启动的间隔时间似乎差不多，但这一段不算短的间隔时间（约20年）对两个国家却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日本的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取向，在这期间，政府陆续兴办了一大批国有工厂企业。主要包括（1）兵工厂、火药厂和造船厂等军事企业；（2）交通运输和通讯事业；（3）开办了十余处金、银、铜、煤矿，以增加国家的金银产量和资源；（4）创办棉、丝纺织工业。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工业开始起飞的时候，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官业处理”（1884—1886）将这批企业转卖给了民间，从而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大型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日本后来的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土耳其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经济发展的时候，实际上是刚刚在开始做日本明治政府在维新后马上就做了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实质性的时间表上可以看出，土耳其的经济现代化要比日本延滞了约20年。换句话说，在土耳其，在约20年的时间里，经济的现代化并没有提上日程。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等国的现代化在这方面也有与土耳其很类似的特点。以至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寿仁教授将这些国家称之为“进行了现代化而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②

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虽然不能绝对地说经济现代化的延迟就一定会导致整个现代化计划的挫折与失败，但也必须看到，经济现代化的及早启动和成功会明显地有利于整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这至少可以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经济现代化的成就可以为前期政治变革成果的巩固创造条件。第二，相对地说，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太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反而有助于消除社会中的某些紧张状态。第三，有助于克服人民中由落后所造成的沮丧感，增强对现代化的信心。第四，经济现代化有助于实现“防御型现代化”的目标。有相当一批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启动，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面对着外部的威胁或挑战，甚至是直接的战争威胁。这种现代化往往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而经济的迅速发展，无疑会有利这种目标的实现。

4. 社会与文化变革问题

如前所述，现代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系统的变革。特别是在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且这种传统与现代化的互容性又很

^① 布赖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一版，第218页。

^② 见文特和陈寿仁主编《文化与工业化》，麦戈洛希尔公司1980年版，第116—117页。

低的社会中，这种社会文化变革的任务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如果不对妨碍现代化的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进行有效的改造，现代化就会面临重重阻力，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任务也难以展开。于是，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中，就时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一种观点：“没有文化的变革就没有现代化”，“首先要有人现代化，然后才能有物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

从理论上讲，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的现代化进程中，真的等到文化变革和人的现代化实现之后，才能展开现代化的其他任务。在后发外生型的国家中，能够集中在一段时间里将社会与文化变革作为现代化主题的国家不是没有（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土耳其），但从大部分国家的情况来看，社会与文化变革都是一个逐步而缓慢的事情。这与早发内生型国家现代化的情形是明显不同的。

另外应当注意到的一点就是，社会与文化变革在后发外生型国家和在早发内生型国家有着甚为不同的意义。在早发内生型国家，现代性是从它过去那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传统的伸延。换言之，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有着较强的连续性，而且，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性都是“自己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与文化变革虽然也是变革，也意味着文明进化的转折，但却有着深厚的内在基础。同时，也正是由于现代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系统是过去的延伸，它与本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也有较多的互容性。而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情况则不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启动，并不是自身内部的现代性不断成熟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在受到外部刺激和挑战时人为启动的。在这种现代化中，现代性的主要来源不是来自本社会的内部，而主要是从外部采借过来的。

这一点，从我国理论界在前几年进行的人的现代化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讨论的最初阶段，许多人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会有社会的现代化。因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首先面临着一个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另一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即现代人是从哪里来的，人的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现实条件？换句话说，没有社会的现代化难道会有人的现代化么？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实际上，近些年来现代化的实践已经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是两个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同时反馈的两个过程。从实际过程来看，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开始不久，观念变革和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就提出来了。首先是思想解放运动，迅猛地冲击着几十年来人为建立的精神枷锁；接着是观念变革和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明确提出，但真正促使这些观念形成的，还是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客观历史进程。在这当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观念变革和人的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又对改革和现代化事业起了进一步推动的作用。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和文化变革与经济政治现代化交织在一起的必然性。

5. 城市化问题

一般地说，城市化总会与整个现代化相伴随的。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当中又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大体与整个现代化特别是经济现代化的速度相一致，两者保持着一种较为协调的关系。另一种是城市化的进程或是在开始的时间上大大提前于现代化的进程，或是在速度上大大快于其他方面（特别是经济现代化）现代化的速度，从而形成所谓“过度城市化”现象。第三种是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特别是在速度上大大低于现代化的速度。这种差异，也会对经济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西欧、美国、俄国（苏联）、日本以及当今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大体可以看作是属于第一种类型。在欧洲，早在中世纪末期，城市就有了一定发展。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城市的过程也大大加快了。在19世纪中，东欧的城市化已经了相当高的程度。在俄国和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迅速的城市化过程。而且从日俄两国现代化的进程看，他们都曾通过行政性措施来促进城市的发展。这对其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资料表明，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共有人口1亿人，其中城市居民只有1400万。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两国的居民共有2.65亿人，城市居民人数达一个亿，同样的比重为37.7%。^①适度的城市化无疑可以对整个现代化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城市作为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的中心，可以推动这方面现代化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城市往往成为现代性因素的诞生地和扩散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工厂、政党、学校、研究机构等这些新型的现代制度与组织形式的形成和存在、都是与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会对农村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同时，城市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对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城市化对资源集中和现代化推进力量的集中，就是明显的例证。

第二种类型主要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其中，以拉美国家最为突出。与西欧、日俄等国家的情况不同，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是工业化的产物。拉美的城市化不仅早于自己的工业化，甚至在时间上比西欧的工业革命还早。拉美国家的城市化基本是开始于殖民地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国家的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从目前来看，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城市人口的比重已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有的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样的城市化程度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工业化的需要和承受力。

中国以及另外少数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种类型。在这些国家中，城市化发展缓慢，明显落后于经济现代化及整个现代化。以中国为例，虽然古代中国的城市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相当发达的，但在进入明清两代以后，城市发展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与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同，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使是在现代化启动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城市化的发展仍然极为缓慢。这种状况对现代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很明显的。除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过的城市化速度缓慢对资源和人力集中的消极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很少有象上海和广州那样的能带动一个地区甚或全国的发展中心。这种消极影响直到现在我们仍清晰可见。

三、影响现代化时序模式差异的主要因素

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这种种的差异呢？

1. 起点条件

一个国家现代化开始时的起点条件，会对其后来的现代化时序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起点条件决定了这个国家在现代化开始时，哪些问题是急迫需要解决的，哪些问题是可

^① 参见布赖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一版，第268—269页。

缓一缓的。

如同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所指出的，土耳其现代化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它在现代化启动之后，曾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进行以社会和文化变革为主题的现代化。而这一特点是直接与它的起点条件，或现代化开始时所直接面对的历史遗产有关的。

在起点条件和历史遗产中，另一个方面就是有没有殖民地的经历，以及殖民地的性质和特点如何。日本、俄国、中国、土耳其等同在现代化的前夜虽也都受到西方列强的威胁和现实压迫，但都没有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这无疑会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会影响到现代化时序模式的特点。在这些国家中，启动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实现内部的政治变革。因此，内部政治变革往往成为现代化时序模式中的第一个因素。而在大部分完全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排在现代化日程表上的第一位的任务则是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推翻殖民主义的统治，获得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此外，在后一类国家中，殖民地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也会对现代化的时序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大多建立了民主政治，从而使政治民主化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如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博茨瓦纳、巴布亚新几内亚、冈比亚、毛里求斯、斐济、秘鲁、美国以及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都是如此。相反，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则走上了另一条政治发展道路。

2. 危机和挑战出现的顺序

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总会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机的挑战。危机和挑战出现的类型和顺序，会对这个国家在现代化中的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现代化时序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班德和佩伊以及他们美国比较政治委员会的同事们认为，在一个国家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时候，一般都会遇到六个方向的危机。①认同危机。在传统社会，人们认同的对象是家庭、家族、部落、村庄、种族等，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成为基本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如果不能形成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就会形成认同危机；②合法性危机。在传统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念、世袭的血统关系以及领导者个人的感召力等都是形成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新建立的政治体制必须建立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形成新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发生合法性危机；③渗透（Penetration）危机。在传统社会中，权力是高度分散的，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求中央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政权不能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必要的机制来执行政府的政策和命令，就会发生渗透危机；④参与危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教育、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社会成员被越来越广泛地卷入到政治生活中来，社会成员的参与意识也会大大提高，如果一种政治体制不能为公民提供必要的参与机会，就会造成社会动荡，从而形成参与危机；⑤整合危机。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分化的程度很低，社会整合也相对容易实现。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分化程度的提高，新的职业群体和利益群体大量涌现出来，如果不能对这些新的群体加以有效的整合，就会形成整合危机；⑥分配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对财富、权力、工作、威望等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就会出现分配危机。①佩伊等人认为，在不同的国家中，这些危机出现的顺序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英国这个最早的现代

① 班德等：《政治发展的危机与顺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

化国家，危机是在不同时间分开出现的，这样就为在特定时间里集中精力解决某一方面的危机提供了可能。因此，当这些危机分别出现的时候，总能化险为夷。而在欧美各国，情形则大不一样。在这些国家中，危机不仅长期积累得不到解决，而且往往同时出现。目前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大体类似，所有危机几乎同时出现，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经常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甚至经常陷入不稳定的困境。^①

在不同国家中，危机出现的顺序和程度的差异，取决于许多与此有关的因素。在这些因素当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起点问题。这个因素对危机顺序的影响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承认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有的国家是从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开始现代化的进程的，欧洲、美国、亚洲和拉美及中东的许多国家即是属于这一类型；而南部非洲、南亚的一些国家以及拉美的少数国家则是在不发达的农业文明甚至是前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开始现代化的进程的。这两种类型的国家，无论是在技术和物质的发展水平上，还是在制度、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发展水平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异的实质是意味着，第一种类型的国家是以与工业文明相衔接的农业文明为基础开始现代化的，第二种类型的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则是比农业文明还要落后的前农业文明。在现代化初期阶段上，第二种类型的国家要面临远比第一种类型国家更为严重的整合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之前，部族政治是其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种族、语言、宗教等多方面的差异使这些小的政治共同体很难整合为新的民族国家，而新建立的国家政权也很难具有巩固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形成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并解决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就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最初阶段的主要内容。而第一种类型的国家，虽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认同危机的挑战，但这种挑战的程度要轻得多。象俄国、日本、中国等国家认同感并没有成为现代化中的主要问题。而如果措施得当，合法性问题也较容易解决。

3. 示范效应问题

如前所述，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会具有一种明显的“一揽子”解决的特点。也就是说，要在同一时间内同时解决早发内生型国家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上分别加以解决的问题。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一是在刚才所分析过的，即危机往往是同时到来的；二是早发展国家对后发展国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影响之一，是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现代化的所有任务的问题。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开始后，由于没有现代化的先例存在，其现代化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痛苦过程。而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那里，在许多方面并不需要这个过程，相反，外部已有的现代化成果已经在“召唤”他们。从经济上看，这种示范效应会大大提高人民对发展经济，从而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期望。从政治方面来看，早发内生型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会对后发外生型国家的人民产生强烈的示范作用。从文化上来看，示范效应会形成文化的多元发展格局，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并存的局面。

影响之二，是使后发外生型国家可以跳跃过某些早发内生型国家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技术和产业结构上。但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这种作用决不能任意夸大。而且，即使是在确实可以“跳跃”的情形中，这种“跳跃”也会同时造成许多新的问

^① 班德等：《政治发展的危机与顺序》，第66～67页。

题。如医疗卫生和保健技术的引进，会打破出生率与死亡率的自然平衡，从而造成人口剧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 现代化策略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似乎有许多迹象都在向人们表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更具有一种全面性的、一揽子解决的特征。但实际上，世界上能在一开始就将现代化的任务全面展开的国家并不多，似乎只有美国是个例外。而就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这样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存在着将现代化的任务“一揽子”解决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现实的条件又限制着这种现代化的实施。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推进者们进行明智的抉择，以平衡这两方面的限制条件。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者们，要明白自己面临的是一种全面性现代化的要求，要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这些全面性的任务一个一个地分别完成。这就要求他们既有推进目标的坚定性，又有策略上的灵活性。

在本文开始介绍的土耳其现代化逐项展开的过程中，策略上的考虑即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伊朗巴列维时期的现代化和中国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在巴列维时代，伊朗曾利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升，伊朗得到大量石油美元的有利时机，迅速开始现代化。但由于现代化的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广，特别是在没有形成和积聚起强大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时候，过早地触犯了宗教势力，结果现代化很快夭折，宗教势力上台，巴列维流亡国外，最后病死他乡。中国的戊戌变法则在百十天的时间里，提出了甚至要用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方案一个接着一个，措施连着出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结果，四面出击，八方受敌，变法维新只搞了百十天，便不得不草草收场。当然，这些失败的现代化例子，都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如伊朗王室的腐败，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叛变等。但其策略的失误，仍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李国庆

书 讯

司马云杰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第一、二部《文化价值论》，2.3万字（定价6.60元）、《文化悖论》24.8万字（定价6.70元）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第三部《文化主体论》还在征订。

（张）